



# “关系”“社会资本”与“关系社会资本”

## ——兼议中国大学场域中的超社会资本和强社会资本

陈卓<sup>1,2</sup>, 郑舒嘉<sup>1</sup>

(1.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2.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浙江理工大学研究基地, 杭州 310018)

**摘要:** 通过整合“关系”与“社会资本”的概念,发现“关系社会资本”更多地涉及中国社会的诸多事实性命题;而且其具有鲜明的指向性,侧重于探讨社会资本中的网络、规范和信任等基本要素缺失后带来的消极后果。中国化的关系社会资本与西方的社会资本在结构与功能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体现为内部要素和外部边界两个方面的差异,后者体现为获取信息和控制局势两个方面的差异。超社会资本与强社会资本是关系社会资本的两种主要类型。通过分析关系社会资本在大学场域中的运作逻辑,揭示其对大学制度现代化建设的复杂影响,为解决中国式大学制度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关系;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超社会资本;强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5) 02-0067-09

## "Relationship" "social capital" and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On the super-social capital and strong-social capital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CHEN Zhuo<sup>1,2</sup>, ZHENG Shujia<sup>1</sup>

(1.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Research Base, Research Cen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y integrating the concepts of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capital", it is found that the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is more related to multiple factual proposi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 clear direction, focusing on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he lack of basic elements such as network, norms and trust in social capital.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between Chinese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Western social capital. The former is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ces of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boundaries, while the latter is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ces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ling the situation. Super-social capital and strong-social capital are two main types of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By analyzing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within the university field,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complex impacts on university system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addressing issues aris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2024-05-08 网络出版日期:2024-10-24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研究课题(22GXSZ059YBM);浙江省教代会工会研究课题(ZJJYGHYB2023031);浙江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jgzd202412)

作者简介:陈卓(1981—),男,湖南怀化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德育原理与教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Key words:** relationship; social capital;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super-social capital; strong-social capital

在中国社会语境下,“关系”作为耳熟能详的概念,在中国大学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者们从各自视角出发,对中国社会极具特色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杨国枢<sup>[1]</sup>提出的“社会取向”、胡先晋等<sup>[2]</sup>关于“面子”的研究。诸多人类学家聚焦于中国家族体系、人际交往以及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等研究领域,如费孝通<sup>[3]</sup>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以及林耀华<sup>[4]</sup>在《金翼》中对“关系”的描写,均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关系”这一概念的内涵,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关系复杂性的理解。此外,黄光国<sup>[5]</sup>巧妙融合了西方的符号互动论、交换理论以及社会资源理论等多元视角,深刻剖析了中国人独特的关系运作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起,尤其是步入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迎来了一个关键性新概念——社会资本。1988年,Coleman(科尔曼)<sup>[6]</sup>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内率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阐释。林南<sup>[7]</sup>在论述社会资本研究的推进路径时,着重指出了三个维度,其中之一便是强调如何有效整合中国特色的关系研究与社会资本理论。比如,在求职过程中涉及不同类型关系(强关系、弱关系等)所承载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可能体现为信息、人情,或是声望、权力及影响。如果不深入探讨社会资本(以及中国化的“关系社会资本”),就无法触及中国大学制度的真问题,中国式大学制度现代化建设也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真正落地的“屠龙术”。尽管关系社会资本领域的文献丰富,但鲜有学者将“关系”“社会资本”与“关系社会资本”三个概念结合起来研究,也尚未通过中西方文化对比,深入探讨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与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本文采用文献对比法,深入剖析大学内部关系社会资本的特性,直观展现大学环境中关系的普遍性。在此基础上,结合中西方文化背景,揭示中西方对关系理解的本质差异,并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根源。围绕关系与社会资本,本文深入探索中国大学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关系社会资本及其衍生出的新概念与新命题,力求全面剖析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特点,并期望该研究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 一、关系与社会资本:解读中国社会的钥匙

关系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构成解读中国社会的钥匙。乔健<sup>[8]</sup>所界定的“关系”,指的是

一种由一个或多个个体及群体作为行动主体而建立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中国人所说的关系与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关系(网)有着显著的区别。“关系网”在西方社会学中不是一个负面的术语,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概念,特别是对社会资本理论来说,已成为一个核心概念。其假设是:a)社会结构由人际关系网组成;b)网络中有价值的资源决定地位,整体呈锥形结构;c)位置越高,占有此位置的点数越少;d)位置越高,对整个结构了解越多,对其他点的可及性较大,即可及的点数多。在西方社会学家看来,所谓有价值的资源是财富、声望和地位,但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这种关系中的血缘成分,使得中国人际关系网在结构和功能上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社会网<sup>[9]</sup>。

回到“结构”上来,也许就能揭示中西文化下人们对关系理解的差异。费孝通<sup>[10]</sup>认为西方社会是群体模式,也就是个人隶属于几个群体;而中国社会是一种差序模式,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围绕着自己,形成了一张具有伸缩性的社会关系网。翟学伟<sup>[11]</sup>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蕴含着一个由微观至宏观逐步扩展的连续统一性特征。“差序格局”所描绘的社会结构正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具象化表现,即中国人在界定社会关系时,是以个体为原点,通过层层递进的关系推理,逐渐将个人圈层扩大。这一过程起始于个体,随后延伸至小家,再逐步扩展到大家,乃至整个国家,最终触及全天下的广阔范畴。

根据翟学伟的观点,在西方,由于兴趣而结成的团体被称为俱乐部,不同个体有相同的爱好,便可以志同道合地共事一些活动。但是中国人不考虑这些,无论认识与否、友好与否,中国人的组织更多地来源于家族、同乡会、同学会、商会等,儒家讲五伦关系,秩序存在于五伦关系里面<sup>[12]79</sup>。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造成这种中西方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中国人在社会关系的建立方面,没有选择的自由<sup>[12]80</sup>。

进一步追溯到历史文化中,中国人之所以重视关系,是因为情理并重的思维方式。在翟学伟看来,长久的无选择导致中国人的理性不容易发展起来(但是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如果将人与人的交往放在一种长期的、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那么就会发展成一种不能太讲理、也不能不讲理的情境。所以在中国社会,光讲理不行,光讲情也不

行,因此要兼顾情理<sup>[10]79</sup>。鉴于此,谈论中国人的关系概念时,需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状态,更要注意无选择与长期性这两个特点<sup>[12]121</sup>,后者体现了中国人在关系概念上与西方人的显著差异。

接下来分析“社会资本”。科尔曼<sup>[13]356</sup>指出,社会资本从根本上来说是无形的,它以人际关系的形式体现出来。社会资本不像物质资本那样具有客观可度量的外形,其最重要的载体就是社会关系网,这张网可以小到家庭、组织,也可以大到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社会。

厘清关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首先需要对社会资本概念做出解释。科尔曼<sup>[13]354</sup>认为,社会结构性资源是指个体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即社会资本。从其功能上看,社会资本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实体,而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各种实体。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定义侧重于“社会”,与乔健的关系定义<sup>[8]</sup>高度一致,两者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林南<sup>[14]2</sup>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体在追求目的性行动(purposive action)的过程中,所能够获取或被动员利用的、且深深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一种资源形式。林南的定义侧重于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即从交换(交往)中获益。将科尔曼和林南的定义综合起来,即可较为全面地把握社会资本的内涵。

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其他资本形式的比较,可以进一步认识到社会资本的特点。普特南<sup>[15]</sup>提出,相较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强调信任、规范与网络,能够促进协作,提升社会效率。奥斯特罗姆<sup>[16]</sup>指出,社会资本是对自然、物力和人力资本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通过对比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其他资本形式的“物质”属性,普特南和奥斯特罗姆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社会”属性。Francis(福山)<sup>[17]</sup>认为,社会资本源自社会整体或其特定部分中普遍存在的信任。社会资本不同于人类资本,因为它总是通过像宗教、传统或历史习俗之类的文化机制来传播。福山将文化资本纳入社会资本的范畴,强调非正式组织和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的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布尔迪厄的资本划分理论更为系统。布尔迪厄<sup>[18]</sup>认为,资本可归结为三大类别:其一是经济资本,作为可即时兑换为货币形式的资产,它以产权制度为基石实现体制化;其二是文化资本,该类资本在特定社会语境下蕴含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可能性,此转化过程通常依托教育资格的认定与制度化体系来完成;其三是社会资本,它构成基于社会关系

网络中的义务(即“联系”),于特定情境下,社会资本同样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其制度化过程则往往体现在通过社会认可的高贵头衔或社会地位来确认与强化。徐贲<sup>[19]</sup>进一步认为,布尔迪厄的理论已经很难适用于我国大学的现实情况:长期以来,中国大学领域内的竞争主要集中于政治与文化资本,而非经济与文化资本。从国内外学术界通用的情况看,较之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的使用更为普遍,影响也更为深远。但就问题的实质而言,这两种资本都应当与现代大学保持一定的距离。

尽管中西方理论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社会资本共有的特点是:第一,作为群体或网络资源,社会资本更具有集体性,而非个体性;第二,使用程度愈高,则愈能增加社会资本的价值;第三,尽管社会资本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但也会迅速流失;第四,社会资本中的两个因素,即信任、协作关系,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固有价值与它们对经济产出的优化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信任、规范、网络三者对社会资本共同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sup>[20]</sup>。在中国大学制度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关于社会资本的命题既是一个事实性的,也是一个规范性的。前者体现在社会资本的前三个共同特征中,后者体现在社会资本的第四个共同特征中。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学者普遍从事实性和规范性相结合的角度谈论社会资本,这导致社会资本与关系产生了重大差别。

## 二、关系社会资本:一种新的解释

将关系与社会资本放在一起讨论,可以大致沿着两个思路进行。一方面,关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这是中外学术研究达成的共识。林南<sup>[14]42</sup>认为,要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源(即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区别开来。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关系获取的资源,文化资本则是社会认可赋予的资源。在中国社会,关系富含独特的意义。翟学伟<sup>[12]119</sup>指出,美国教科书常讨论种族与偏见问题,而中国教材较少涉及;反之,将关系纳入美国教材亦非必要。

从不同视角看,就关系与社会资本两者的关系而言,与西方社会资本相关的命题往往体现的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复杂性;而与中国的关系相关的主要是事实性命题,研究者更倾向于用关系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不同于西方人”。基于此,可以归纳出两种基本观点:其一,认为关系不同于社会资本,以翟学伟为代表;其二,认为关系就是社会资本,以陈云松为代表。



在翟学伟看来,中西方在“关系”与“社会资本”的理解上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社会资本融合了结社、合作、信任等多维要素,而中国的关系则根植于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强调血缘、地缘及由此派生的各种人际关系<sup>[21]</sup>。第一种类型的组织形式更多是团体关系,而第二种类型的形式更多是个人关系。翟学伟<sup>[22]</sup>指出,当一个人的社会网络是自然形成、无需刻意争取时,他在利用这一网络时往往不会主动思考自身的责任与义务,而更倾向于无节制地、依赖性地滥用其中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他可能会忽视家庭以外的其他社会规范,以及评估所利用的关系是否符合这些外部规范,这恰恰是潜规则在中国社会得以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黄光国<sup>[23]</sup>的思路与翟学伟大体一致:个人若有求于人,往往设法“搞关系”“拉交情”,请对方多加“照拂”,以“人情法则”和自己打交道。近年来,部分大学行政化导致“外行领导内行”“劣币驱逐良币”,大学招生、后勤等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往往就是与关系的上述负面功能联系而产生的结果。

关于关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陈云松<sup>[24]</sup>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中国语境中,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可以称为关系社会资本,或简称为关系。陈云松<sup>[25]</sup>聚焦于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与网络资源,而非社群共享的信任、共鸣等集体层面的资产。他特别关注中国社会背景下个人如何运用社会资本的行为模式,将“关系”视为构建、运用、积累及推动社会资本演变的关键社会结构要素。无论是群体层面的公共参与,还是个体层面的社会交往,其嵌入在网络中的社会资源,都会在群体或者个人层面对经济社会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群体层面,社会资本是能给团体尤其是团体中所有成员提供利益的社交网络资源;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即关系社会资本),

是一种能够给个人带来利益的社会关系资源。

上述两种观点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分野,而非内容与逻辑上的根本对立。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社会结构与互动机制,本部分将提出一个整合性概念,即关系社会资本。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关系研究以家庭为基础,而社会资本研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两者在个体选择性、成员资格、公共利益、参与性、为人处世五个层面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sup>[26]</sup>。本文所提出的关系社会资本概念,旨在借助社会资本所强调的网络、信任、规范等要素,研究中国社会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这个概念更多地涉及到中国社会的诸多事实性命题(与陈云松强调社会资本客观“影响”的观点较为接近);与此同时,其又具有鲜明的指向性,侧重于探讨社会资本中的网络、规范和信任等基本要素缺失后带来的消极后果(与翟学伟对关系的分析较为接近)。基于这个逻辑,不同于陈云松的概念,本文所说的关系社会资本并不局限于个体层面,相反,其更多地指涉群体互动和社会结构,这也是大学制度研究的应有之义。

在本文的概念体系中,关系社会资本又叫“中国化社会资本”,这里的“关系”“中国化”是历史指向而不是未来指向的概念,这意味着本文更多的是从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谈论“中国元素及特色”的社会资本;中国化社会资本是一个批判性概念,本文旨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为中国式大学制度现代化建设提供改革目标和工作抓手。

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歧义,参照西方社会资本,本文将中国的关系命名为关系社会资本(中国化社会资本),由表1可见社会资本与关系社会资本两者的区别。

表1 社会资本与关系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比较

类型	结构		功能	
	内部要素	外部边界	获取信息	控制局势
社会资本	三个要素:网络、信任、规范	边界明显,能区别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	规则下的透明	规则平等
关系社会资本	核心要素:关系(权力、情面)	泛化,与其他资本交织在一起(总体性资本)	不透明,暗箱操作	潜规则

从历史上看,中国化社会资本具有三大特性:边际模糊性、表里双重性和差距层级性<sup>[27]</sup>。在本文的概念体系中,关系不仅涵盖了“面子”和“人情”,而且将“权力”纳入其中,若与社会资本联系起来,最终可以延伸出“强社会资本”(与“人情”“面子”“情面”相对应)与“超社会资本”(与“权力”相对应)这两类关系社会资本。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往往表现为

权力与情面的彼此渗透、交互作用。为了深入分析中国大学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关系社会资本,可以围绕权力和人情,进一步区分出表现为硬关系的超社会资本和表现为软关系的强社会资本,并根据吉登斯<sup>[28]</sup>关于资源和规范分类思路,对两者的特点进行比较。由表2可知超社会资本与强社会资本两者的区别。

表 2 超社会资本与强社会资本的特点

名称	类型	资源	规范
关系社会资本 (中国化社会资本)	超社会资本(硬关系) 强社会资本(软关系)	权力 情面	权家通赢,赢家通吃 讲人情、给面子

需要指出的是,超社会资本(权力)与强社会资本(人情、脸面)并非截然分开的,在大学制度的运行过程中,两者常常交织在一起。以下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关于“大学博士培养质量调查”的一次访谈中,高校管理人员 C4 不仅揭露了博士研究生群体中存在“混”的现象,还进一步指出教师队伍中亦不乏“混”的博士,这类人被称为“水货博士”;“水货博士”的个人学术素养本身存在缺陷,部分老板(博士生导师)本身就是水货。有趣的是,调查者本来还打算就“混博士”“水货博士”特别是“水货老板”进行提问,C4 立刻警惕起来,因为他怕“得罪人”。C4 说,如果他接受了这个采访,领导会发火,到时候他就会得罪一大群人。“得罪”在 C4 的话语中反复出现……最后,为了避免引起他的反感,我们必须尊重他的意见<sup>[29]</sup>。通过此例可以看出,在一个“闲谈莫论他人非”的环境中,调查者让 C4 这样一个高校管理者说出“水货博士”之类的“肺腑之言”,已经实属不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调查者所谓的“双面子”问题:一方面要顾全他人的面子,以维持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今后的社会交往中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利益”问题:“领导会发火”和“得罪一大群人”,这两点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面子受损,更多的是利益受损。换言之,C4 欲言又止的状态,其根源不仅深植于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人情面子(与强社会资本联系),同时也受制于一种既具吸引力又令人畏惧、但目前却无能为力的权力(与超社会资本联系)。

三、中国大学场域中的超社会资本和强社会资本

2021 年末,《中国纪检监察》刊载了一篇题为《晒一晒“象牙塔”里的那些官僚主义》的文章<sup>[30]</sup>,将“‘象牙塔’里的官僚主义歪风”概括为:“官气”十足,衙门做派;门户林立,近亲繁殖;不务正业,攀附结交;好高骛远,贪图虚名。“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式大学制度现代化建设必须攻克的一项顽疾,深入了解关系社会资本的运作逻辑有望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施策方向。本部分立足于前文的分析,分别讨论大学场域中的超社会资本和强社会资本。

(一)大学场域中的超社会资本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学的市场逻辑日益受到重视。理性系统视角下的“学术资本主义”强调的是有底线的大学市场化竞争,但从自然系统来看,“底线”的缺失并不少见。因此,众多学者纷纷指出,大学的作用甚至是无价的,仅仅用市场价格来估价大学的价值,的确是对大学价值的贬损。然而,若思考仅止步于此,显然还远未达到足够的深度与广度。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与变迁。然而,社会变迁的渗透力与影响力展现出深刻的层次分化与个体差异性。部分群体能够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正面效应,同时规避其竞争机制下的负面冲击;相较之下,其他群体则必须直面市场经济残酷的竞争压力,而缺乏相应的外部保障机制来减轻其承受的负担<sup>[31]</sup>。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大学价值的贬损是否仅限于市场化进程的单一作用?换言之,是否存在其他途径或策略,其对于大学价值的贬损同样产生强烈的影响,乃至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越市场化的负面影响?答案是肯定的。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高校中,教育行政化(或称为“教育衙门化”)现象较为普遍<sup>[32]</sup>。这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而这正是超社会资本作用的集中体现。

权力制衡制度的缺失是滋生超社会资本的“温床”。在资源分配上,权力横行无忌,是经济领域“权力寻租”这一概念在大学中的体现。尽管权力寻租普遍表现为“根据行政权力寻求自身资源最大化”,但在大学场域内,超社会资本的具体运行方式却展现出独特的差异性。吴思<sup>[33]5</sup>提出了“合法伤害权”概念,即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从负面视角审视,大学场域内的超社会资本往往体现为行政权力对“合法伤害权”的利用,以此作为手段,旨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在古代社会,平民百姓对官吏心存畏惧,往往不得不以贿赂之举以求自保,非为谋求私利,实为防范无端之灾祸降临;部分官吏们的专长便是合法地祸害别人。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各种资源与财富得以重新分配与调整<sup>[33]4</sup>。

在日常的大学生活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权势者利用超社会资本“威逼”与“利诱”两手抓的现

象并不少见。若放到大学场域的制度环境中,仍然可以按照制度逻辑从大学外部和大学内部两个方面分析。在准单位制下,大学外部的超社会资本主要掌握在国家政府官员手中,为了生存发展,大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委身于人”。这种依附权力获取资源的方式更多地体现为“积极关照权”。与之相对,在大学内部,由于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和资源集中程度下降,加之内部人员之间频繁多样的交往,越是靠近制度的微观层面,“合法伤害权”出现的频率就越高。

鉴于上述现象与政府权力的紧密关联,超社会资本展现出“超级”与“超越”的显著特性,这一特性对大学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根据作用方向的不同,可以将大学中的超社会资本分为内敛型和外张型两种。两者都是掌权者在垄断高等教育资源基础上的权力寻租,区别在于:内敛型超社会资本是掌权者坐地分赃,表现为一种非公开的操作方式,采取的姿态是“守势”;外张型超社会资本则是掌权者走出“家门”面向外界,直接染指大学资源,采取的姿态是“攻势”。

一方面,内敛型超社会资本体现为权力部门在分配大学教育资源时的不公正。在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下,社会资本自其萌芽之初,便深刻地烙上了政治印记,呈现出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相互交织的固有特性。在探讨英美学术精英时,鲜有研究将政府和行政权力的作用纳入学术认可的考量范畴,而在中国,这一因素却是关键性因素<sup>[34]</sup>。中国正规大学往往被纳入等级分明的官僚体系,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延伸至大学的基础教学与研究单位,单一的行政权力贯穿始终,使得所有优秀人才都处于其影响之下。这个官僚体系不仅塑造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况,也为其未来的发展轨迹设定了框架,影响了中国大学的教学与学术环境,由此也确定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道德标准<sup>[35]</sup>。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联姻导致了超社会资本下中国学术生态的“特色”。

另一方面,外张型超社会资本体现为强势阶层对大学教育资源的直接染指。从理性视角看,在社会资本作为网络的定义中,个体受益于规范,但这样的收益却是以机会主义者的短期收益为代价换来的。通过限制短期私人收益,规范促进了合作,反之,合作使得行为者实现了长期利益。总之,社会进程导致了遵从,这是使合作得以维持的因果机制,而这些相应地将规范转化为可替代的资本,利用群体表现的手段来实现<sup>[36]</sup>。然而,在超社会资本面前,规范本身极容易发生变异,可能对大学本应遵循的

学术逻辑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 (二)大学场域中的强社会资本

超社会资本源于不受制约的权力,其在大学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与之相对,强社会资本则具有一定的正面功能。与此同时,也需要对强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它主要表现为人情泛滥与学术萎缩。

### 1. “要面子”:强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

强社会资本的正面功能主要通过“面子”得以发挥,这方面已有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华人的日常用语中,“面子”代表着被广泛重视的社会声誉:这是人生历程中的步步高升,是靠成绩和夸耀获得的名声,也是靠个人的努力或者刻意的经营积累起来的名声<sup>[37]</sup>。不管是“顾面子”“给面子”还是“争面子”,归根结底都是“要面子”。在黄光国<sup>[38]</sup>提出的“华人社会中的冲突化解模式”框架下,强社会资本在大学制度建设中展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

第一,“顾面子”。在中国社会,构建关系网络是积累社会资本、获取利益的重要途径。比如,很多研究生在入校选择导师时,除了考虑导师的人品和学术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脉。中国社会中的人脉往往与职务挂钩,位高权重者往往具有更为广泛的人脉资源。因此,具备行政职务的导师因其能够动用强社会资本,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关照”,成为众多学生竞相选择的热门导师人选,而同行往往出于“顾面子”,即便内心存在不同意见,表面上也不会推辞。学生与学术地位高的学者建立关系,实际上是其调动社会资源的文化策略,有助于学术认可与学术地位的提升<sup>[39]</sup><sup>68</sup>。“投资”于有权势有声望的前辈,可以大大节省“交易成本”,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给面子”。在中国,“情商比智商更重要”这类话语早已深入人心。这里的“情商”,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强社会资本。情商高的人,大都懂得给对方面子。强社会资本在大学教师年度考核过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导致考核实际上流于形式。为何评优是系里决定?为何除了被评为优秀的人,其他人都默认为合格?这里体现的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各种“大智慧”。不管是教学系(部)的领导,还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都深谙此间道理,“睁一眼闭一眼”“难得糊涂”,彼此都“给点面子”。在考核制度亟待完善的前提下,正是这种不“赶尽杀绝”的做法,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将大学教师之间的矛盾尽可能降低,保持了教师队伍的稳定。



第三,“争面子”。在有些场合,强社会资本也可能构成与超社会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诚如季羨林所说,“要面子”有时候正是知识人应当有的素质,是文人风骨的体现。在2017年11月17日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准备同代表合影时,请93岁的黄旭华和82岁的黄大发两位道德模范代表坐到自己身旁来。习近平总书记“让座”的这个细节,让人唏嘘感慨。如果能多一些“争面子”的大学教授,多一些给知识人面子的领导干部,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加快很多。

## 2. 人情泛滥与学术萎缩:强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

强社会资本对于中国大学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从现实合理性的角度而言;如果将视角转换到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最终目标,强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就更加明显。后者对大学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人情泛滥与学术萎缩。

基于强社会资本的人情文化,如今已成为我国现代人格塑造与现代伦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面临的一项挑战。人情可以使人“上天”,可以使人“入地”,可以使理性沉沦、人格堕落、法制荡然、价值规律扭曲、权利义务颠倒<sup>[40]</sup>。在情理交织的社会架构中,中国人巧妙运用人情与面子的运作机制,往往能够超越既定规则、理性逻辑及正式制度的框架限制,有效地获取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社会支持,并在日常生活中构建起一种权威体系<sup>[41]</sup>。从总体上看,上述种种“好处”,都是与现代社会理性、民主、法治等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强社会资本大行其道,大学本应追求的公正价值和理性精神便会消弭,人情泛滥必然导致人性萎缩,最终败坏大学生态。

在大学环境中,人情现象的过度渗透显著体现于一种所谓的越界使用现象,即原本专属于亲缘关系的称谓(如“老大哥”“兄弟”“哥们儿”“小兄弟”及“姐妹儿”等)被不恰当地引入并频繁应用于学者间的私人学术交流场合,这些称谓被赋予了衡量关系亲密度与情感联结深度的象征性意义。此外,这一趋势还延伸至高校间的互动,表现为频繁采用“兄弟院校”的称谓,以此强化校际间的情感纽带与合作关系。中国人往往善于拉关系,在尚无“老关系”、有待开辟的领域中,可以找出关系、拉出关系,而且“找”和“拉”的具体方式也常常是拟亲缘的<sup>[42]</sup>。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术界亦普遍存在此种现象,即学者之间通过共同的学习经历、会议参与、合影留念、聚餐交流以及学术讨论等活动,能够迅速拉近彼此间的

距离,构建原本没有的关系纽带,并逐渐使之拟亲缘化。不仅如此,学者倾向于依据亲疏关系为其学术交流网络划定明确的界限,以此区分“自己人”与“局外人”,并可能采取排他性策略以巩固“小圈子”的形成。这种基于亲缘或拟亲缘关系的学术关系网络构建,在学术资源的分配与学术声誉的认可机制中,进一步为圈内成员创造了相较于圈外人更为有利的竞争优势<sup>[39]68</sup>。

强社会资本的运行导致大学本末倒置,形式主义泛滥,虚情假意盛行。有论者讽刺:参加学术研讨会,重要的是能见到那些与会的人而非探讨学术。年长者可以直观了解彼此身体状况,初出道者拜见一下专家,为未来在职称评定、项目评审及学术奖项竞争中争取潜在的推荐与支持。研讨会上部分学术期刊的编辑很受欢迎,有学者借此机会顺道询问其投稿作品的审稿进展与可能的录用情况,以此作为未来在该期刊上发表更多学术成果的铺垫。纯粹基于学术兴趣而参加研讨会的情况并不多见;相反,多数参与者的出席更多是支持面子工程。具体而言,专家的参与往往被视为对活动学术价值的肯定,即“给面子”;权威官员的出席则常被解读为对活动影响力的提升,即“撑场子”;而对于初出茅庐的学者而言,参与研讨会更多是为了增加“露脸”的机会<sup>[43]</sup>。在访谈中,一些受访对象直言不讳指出“学术会议越来越变成一个会朋友的场所”。学术会议常由专业学会主办,并委托高校或研究机构承办。主办方选择承办方时,除学术考量外,还可能受到关系因素的影响。一些学术影响力较弱的学校也可能获得承办机会,以提升其学术声誉。院校之间、学者之间“拉关系”固然存在,而且也很有必要:“大家一年见见面,互通有无,通过学术信息和研究进展,很有必要,开阔眼界嘛!学术会议也起着开阔眼界的作用,因此拉关系也是不可避免的。”<sup>[39]139-140</sup>对不少研究生而言,参加学术会议的社交意义往往超过了学术意义,这原本似乎无可厚非,在如今反而更显得天经地义。然而,这种观念实则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在强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大学的某些评价标准发生了偏移,“吃得开”代替了求真务实,“人脉广”代替了志向高远。调查发现,针对“在中国要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学者,以下选项的重要程度如何?”的问题,选择“同行交流”这一因素上的差异最为显著,讲师的平均分最高,副教授的最低,教授的居中;在“导师地位”“特殊关系网络”两个因素上,讲师的平均分亦

最高;而“导师的指导”的得分较低<sup>[39]157</sup>。从调查结果上看,讲师们较为迫切地关注“同行交流”,但这里的“交流”重点并非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亦即“导师的指导”所强调的意思),更多的是利用“导师地位”,搭建“特殊关系网络”。显然,在部分青年教师的认知框架内,学校已经不是文化资本角逐的场地,更多的是依赖于中国化社会资本,这仿佛成为了所谓“特殊关系网络”的应有之义。

#### 四、结 语

“关系”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本文从“关系”出发,探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存在的过于重视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通过典型案例,呈现大学场域中无处不在的“关系”,阐释中西方语境下对于“关系”理解的差异,并探讨其社会文化根源,进而深入分析关系与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与中国大学制度两组概念的内在关系,总结中国关系社会资本的特点,以发现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面临的真问题。本文聚焦典型案例、剖析相关命题,旨在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特色”提供理论基础,并期望得出的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视角与参考。在推进中国式大学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关系社会资本,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关系社会资本涉及到大学制度建设的多个方面,对其研究难免顾此失彼;更重要的是,由于“只做不说”或者“只说不做”,关于关系社会资本的证据很难收集。鉴于此,本文主要根据已公开的文献,通过与国外常用的相关概念进行对比,探讨大学场域中关系社会资本的基本特点。未来研究将从两个方面入手,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一方面,围绕规范化的行政权力和专业化的学术权威,进一步完善权力规范机制;另一方面,围绕道德权利、法律权利与习俗权利,进一步完善权利保障机制。

#### 参考文献:

- [1] 杨国枢.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J].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005(1): 21-54.
- [2] 胡先晋, 欧阳晓明. 中国人的脸面观[J].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006(1): 1-17.
-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 [4] 林耀华.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 [5] 黄光国. 中国人的权利游戏[M]. 台北:远流图书公司, 1988.
- [6]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4): 95-120.
- [7] 林南. 从个人走向社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2): 213-223.
- [8] 乔健. 关系与义[M]//杨国枢. 中国人的心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82.
- [9] 翟学伟. 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20.
-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香港:凤凰出版社, 1947: 22-30.
- [11] 翟学伟. 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框架、概念与关联[J]. 浙江学刊, 2021(5): 53-64.
- [12] 翟学伟. 关系与中国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13] 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 邓方,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14]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5] 普特曼. 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J]. 杨蓉, 编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9(3): 60-63.
- [16] 奥斯特罗姆. 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的概念? [J]. 龙虎, 编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2): 26-34.
- [17] Francis F.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26.
- [18] 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 包亚明,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92.
- [19] 徐贲. 教育场域和民主学堂[J]. 开放时代, 2003(1): 87-96.
- [20] 汤克斯. 信任、社会资本与经济[J]. 李煜煜, 编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5): 42-49.
- [21] 翟学伟. 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89.
- [22] 翟学伟. 中国的“关系”为何无法成为社会资本[J]. 人民论坛, 2009(14): 7.
- [23] 黄光国. 中国人的人情关系[M]//文崇一, 萧新煌. 中国人:观念与行为.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41.
- [24] 陈云松. 关系社会资本新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1-2.
- [25] 陈云松. 社会资本的建构性与动态演化模型:以年羹尧事件为例[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4, 51(5): 142-156.
- [26] 翟学伟. 是“关系”, 还是社会资本[J]. 社会, 2009, 29(1): 109-121.
- [27] 陈卓. 超社会资本、强社会资本与教育公平:从当今中国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J]. 青年研究, 2010(5): 75-84.
- [28]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李康, 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79.
- [29] 周光礼.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基于 U/H 大学的案例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97-198.
- [30] 于国君, 郭妙兰, 余哲西. 晒一晒“象牙塔”里的那些官僚主义[J]. 中国纪检监察, 2021(24): 42-44.



- [31] 郑永年. 保卫社会[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156.
- [32] 张福宝. 关于高校教育行政化、商业化问题的探析[J]. 课程教育研究,2014(35):43.
- [33] 吴思.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34] 阎光才. 学术系统的分化结构与学术精英的生成机制[J]. 高等教育研究,2010,31(3):1-11.
- [35] 韩水法. 世上已无蔡元培[J]. 读书,2005(4):3-12.
- [36] 维克托·尼. 新制度主义的源流[M]//薛晓源,陈家刚. 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9-100.
- [37] 黄光国.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75.
- [38] 黄光国. 关系与面子:华人社会中的冲突化解模式[M]//陈炬之,梁觉. 迈进中的华人心理学.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180-207.
- [39] 张斌. 学术场域的政治逻辑:一项关于学术权力的社会学考察[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 [40] 秦晖,金雁.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258-262.
- [41] 翟学伟.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6.
- [42] 郭于华. 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J]. 社会学研究,1994(6):49-58.
- [43] 张建伟. 学术研讨会三题[N]. 法制日报,2019-05-08(10).

(责任编辑:陈丽琼)